

Yanjiuxing Daxue Neibu Guanli Yunxing Jizhi Yanjiu

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 运行机制研究

蔡世华 等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 运行机制研究

蔡世华 等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研究/蔡世华等著. —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 - 7 - 5646 - 0891 - 0

I. ①研… II. ①蔡… III. ①高等学校—学校管理—
研究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0848 号

书 名 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研究
著 者 蔡世华等
责任编辑 王德福 夏 然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2007年,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强调要努力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加快推进研究型大学建设步伐。尽管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内涵与标准尚有不同的认识,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追求并致力实现建设研究型大学目标的热情与执著,实际上,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国内许多著名高校的共同追求,并成为团结和凝聚师生员工的重要精神动力。有的学校甚至明确提出了建成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

但是,国内高校近十年来的办学实践也证明,建成研究型大学——这一组织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需要包括制度、文化、资金、人力资源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协同,其中,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模式是一个尤为关键和重要的因素。显然,基于研究型大学发展目标定位较高,相应的其内部的组织架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自然与一般教学型大学不尽相同。这方面,尽管欧美各国的研究型大学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现成的参照标准与学习榜样,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简单移植国外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制度;即使在一国之内,不同大学的历史传统、办学体制与学科结构不同,各自的内部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每一所致力于建设研究型大学的中国高校都需要积极探索和构建符合本校实际的管理运行模式。蔡世华等同志撰写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研究》一书,就是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建设研究型大学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就这一问题进行再思考的成果。

从高等教育管理的视角来看,研究型大学对于大学管理到底提出了那些特殊的任务与要求呢?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准确把握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我认为,研究型大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拥有“卓越的学术”,表现为对高深知识的传承(高水平的教育教学)与探索(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而所谓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实乃是这种“卓越”品质的必然结果。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大学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文化等,都应当围绕并服从于这一本质要求,通过加强大学内部管理,形成一种有利于追求卓越、崇尚学术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但事实上,在大学的管理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同追求学术卓越的办学目标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是大学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只有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尊重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律,从制度和体制上根本解决这一矛盾,不断改革、调整和完善校内管理运行机制,才能构建有利于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制度环境,形成“崇尚学术”的大学制度文化,从而促进大学办学水平与质量的提高。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蔡世华等同志撰写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研究》一书,正是紧紧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和基本矛盾而展开,就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运行特征、研究型大学管理的核心要素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总结借鉴国外研究型大学管理经验、反思我国大学管理中的薄弱环节,从而提出了构建研究型大学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问题。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有些观点的论证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总体上体现了作者的理论创新意识和实践探索精神,其中有些观点和思路对于建设研究型大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在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有两方面的研究人员。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学学科专业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提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范畴、构建学科的理论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引领着学科的学术研究方向,其研究偏重学术性、思辨性;另一方面则是从事大学管理的实际工作者,他们往往立足岗位,结合本校实际或本职工作进行经验总结,其研究往往偏重应用性与操作性。如何把这两方面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既具有理论学术价值,又能对大学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这是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本课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几位作者原来都在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办公室工作,能够结合本职工作的工作实践,按照学校建立研究性管理队伍的要求,积极开展理论思考,这对于提高自身的管理素养和改进大学管理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值得肯定和祝贺。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满足已有的研究结果,而是继续学习,不断探索,努力取得新的成绩!

是为序。

2010年11月

目 录

序	罗承选(1)
绪 论 对研究型大学功能特质与管理结构的再思考	(1)
第一章 研究型大学及其管理运行机制特征	(36)
第二章 研究型大学管理的核心要素及其作用分析	(69)
第三章 国外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104)
第四章 制约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管理因素探析	(151)
第五章 研究型大学的动力机制研究	(184)
第六章 研究型大学的平衡机制研究	(221)
后 记	(273)

绪 论 对研究型大学功能特质 与管理结构的再思考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转型时期,经历着现代化、全球化和市场化三大历史课题的考验,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元化与国际化的三大潮流也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发展。要建设研究型大学,就应当很好地思考大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到方向明确、制度合理,力量集中、运转高效,从而逐步达致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启动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提出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的任务,这对我国大学的投资规模、办学质量、层级分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建设研究型大学成为许多高校追求的目标,其中国家高强度投入、综合办学实力较强的“若干所”国内著名高校,更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与此同时,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大学的历史性变迁之处在于,开始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姑且不论这种进入是主动进入还是被动推进),成为政府、企业、社会与公众共同关注与充满期待的对象,似乎国家的发展、企业的强大、社会的繁荣乃至家庭与个人地位命运的改变,都寄托在大学身上,大学组织在知识创新中的核心与主体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政府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以后,建设研究型大学就不仅成为大学自身追求的目标,而且已成为整个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有些学者还从大学兴衰与世界文明重心的转移的角度,论及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可见加快建设研究型高水平大学步伐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对研究型大学的内涵、特征以及怎样建设研究型大学的问题,不少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与研究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凡事知既不易,行则更难。目前,人们对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完全厘清,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更是千差万别。(尽管也有一些民间评估机构制定了一些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此进行大学排行,但对其结论的争议本身即说明人们对研究型大学内涵认识上的差异。)甚至有些大学在办学目标(研究型大学)与办学实践(市场化机制)之间存在着南辕北辙的现象。但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办学目标却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共同理想,甚至成为一种“情结”。正因如此,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不在于研究型大学定义的界定与量化指标的测定,而重在就管理层面如何确立有利于研究型大学建设与发展的管理运行机制。

一、高品质,卓越性:对研究型大学功能定位的再认识

随着大学组织的发展演变及其在国家和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大学的功能由原来单一的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发展到研究学术、创新知识,并进一步为社会经济提供各种技术、智力服务^①。由于每一所大学在上述几种功能方面的实际能力与水平有很大不同,因此也就客观形成了大学的层次与类型。研究型大学,顾名思义,乃是指其主要功能、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大学,但是也并非只有这一种功能。事实上,由于其以传承、探索、创造高深知识为核心的本质特征,使得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获得了为一般教学型大学所难以达到的

^① 关于大学功能拓展的利弊,已经有学者论及,笔者也认为,大学的功能不能无限地增加,大学应当意识到自我领地的界域,防止在扩张中迷失大学的本真特征与核心使命。

更加突出的综合优势。具体而言,研究型大学一般具有如下四种卓越的品质:

首先,研究型大学的首要目标在于培养和造就高层次的精英型人才。既然是大学而非研究院(所),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使命仍然是培养人才,教育教学活动在研究型大学中仍居于基础地位。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初期,一般都比较忽视本科教育,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重建,人才培养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但是与一般教学型大学比较而言,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办学层次较高,在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二者之间,以后者为重心。据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中提出的标准,研究型大学要提供学士学位直到博士学位的教育,每年至少授予50个博士学位。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在校规模大体在1:1或1:2左右。二是采取研究性的教学教学模式。与学校的总体办学目标相适应,即使是本科教育,也以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能力为主要任务,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最新科研进展、研究方法的讲授,师生之间更多进行交互式、研讨式的学习与交流,学生甚至直接参与教师的科研过程。三是毕业生具有较高的社会成就与声望。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由于其在校期间获得了较强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因而在工作中能较快发挥作用,取得成果,得到器重和提升,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或技术骨干。国内外许多被推许为研究型大学的高校,都拥有一批值得自豪的、社会声望很高的校友,从而使得研究型大学成为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重要基地。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研究大学的人才培养功能,仍然属于精英教育层次,“它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后,精英教育作为扬弃之后的保留的体现,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仍保留着精英教育的部分”^①。

^① 吴松,沈紫金. WTO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其次,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能力在于知识创新、探究真理,即致力于从事高水平、前沿性的学术研究。这是研究型大学有别于一般教学型大学的最为本质的功能与特征。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型大学都拥有一批造诣深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的专家学者,他们或提出重要的理论创新,或获得重大科学发现,或推进工程技术进步,或实现制度观念突破。还是以美国大学为例。在美国历次“全美最佳十所大学”的评选中,麻省理工学院都名列前茅,并被认为是全美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主要原因即在于该校杰出的科研成绩,阿波罗登月舱的导航系统设计,均出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之手^①。另据统计,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对该国科技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70%诞生于一流研究型大学,1993~2000年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51人中,47人来自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简言之,研究型大学在整个国家的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科技贡献率。至于其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基地等)的数量,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获得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额度,发表高水平科技论文及其转载率等等,只不过是研究型大学科研实力的外部表现而已。核心问题在于研究型大学师资队伍的水平与创新能力。

其三,基于上述两种基本功能,研究型大学可以为企业、政府与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广义而言,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都是大学履行服务社会职能的基本形式。这里所谓社会服务只是沿用普遍的说法,更多的是指大学为企业发展、政府与社会公共事务服务的情况。一方面,就大学自身的使命与追求而言,如果说学术研究与知识创新主要可以在大学组织内部完成的话,那么知

^① 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识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就需要走出大学、借助并服务于外部组织的需要,即通过产学研结合、官产学研结合等形式,实现大学组织与外部世界的功能对接,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大学组织的发展目标与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直接,转化的时间也愈来愈短,大学在提出新的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同时即可以进行知识的转化与科技产品的孵化,从而为企业开发、社会服务提供新产品、新技术的支撑。因此,大学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产品的孵化器与推进器。此外,从政府管理角度看,由于现代社会组织的复杂性、社会管理的专业性与科学性,仅靠传统管理经验或政府权威已经无法有效处理各种公共事务,愈来愈需要大学教授、学者专家的咨询、参谋和决策作用。而研究型大学所拥有的人才智力优势是一般性大学所无法比拟的,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既是研究型大学中的教授,同时也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智囊团与思想库,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正是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走出象牙塔”理念以来许多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特征。

其四,研究型大学还具有高品位的文化示范功能,应当成为民族先进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如果说上述三种功能是研究型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工具性”作用的体现的话,那么文化示范功能则是研究型大学的“价值性”作用的体现。大学并非只是政府和社会实现某种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大学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价值存在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因为作为人追求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精神领地,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的守望者与阐释者,也是文化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探索者与先驱者。“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研究型大学是高层次人才的荟萃之地,是知识分子精英的“联合体”,而知识分子理应是社会正义与公共

良知的代表者与守望者,必更以其自身的知识理性与道德良知赋予大学文化独有的先进性、批判性与开放性。因而研究型大学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操守,应当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时期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的主要标志。正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当时的学术教育中心,而且成为传播新文化、开辟新纪元的时代前哨,成为民主科学的坚强堡垒。

二、崇尚学术,增强定力:坚守学术研究在研究型大学价值追求中的主体性与核心性地位

传授已知知识与探索未知知识,这是教学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在对待知识上的重要区别。在研究型大学中,开展学术研究,探索未知知识,以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是办学活动的主体部分与核心目标。但有些学者认为,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工具性目的”,是为高等教育的“实质性目的”服务的^①。如果说这一观点比较符合一般教学型大学实际的话,而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则是不准确的。因为仅仅把学术研究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功能性目标,不是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本质与使命来对待的话,研究型大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工具性”组织,就难以保证学术研究的主体与核心地位,难以体现学术自由与探索真理在研究型大学中的价值导向作用,也就很难不迷失自己的真正目标。正如一流的科学家从来并不把拿到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是他们对于未知世界和真理的热忱以及对于人类发展负有的使命感,促使他们终身致力于科学探索,甚至不计成败得失。我们认为,这恰恰应当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由此,研究型大学要确立学术研究的主体与核心地位,必须坚持以下三原则:

一是坚持学术研究活动的自主性。所谓自主原则,是指学术

^① 薛天祥. 高等教育管理学.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研究过程中,研究课题、研究方向、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的运用等,都是研究者根据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体系的发展趋势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而自主确定的,不受大学之外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更不是受课题经费的诱惑而为他人进行雇用性的研究活动。在这个问题上,研究型大学必须十分小心地把握好政府、企业资助研究与大学自主研究之间的关系。初看起来,这种建议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似乎刚好相反,因为正是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巨额经费资助,一批美国式研究型大学才迅速崛起。但是美国大学的体制源于欧洲,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传统,联邦政府基于对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观念的维护,不会也没有削弱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因此,政府与企业对大学学术研究的经费资助与大学接受这种自主开展研究,不是一种指令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当然,在这种经费与机会的提供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当然希望大学的办学能够有助于自己目标的实现,会对大学提出履行责任的要求,甚至会形成某种压力。这就需要大学善于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始终保持独立法人自主办学地位,始终保持大学的“学术气质”^①。

二是追求真理至上与学术自由。这一原则向来被认为是大学的灵魂与生命所在。无论是19世纪的柏林洪堡大学,还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都强调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利,当国家和社会以各种形式试图干涉或影响大学事务的时候,学术自由就成为一面最重要的旗帜被高高举起。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应当给予研究者和学习者最充分的自由权,而不应当有事先设定的所谓“禁区”或不得冒犯的“权威”。大学的管理者常常担心学者们会滥用学术自由权,甚至超越学术领域而影

^① 菲利普·G·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响现实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对此笔者认为,真正对学术自由有着理性自觉的学人,必然同时也是一个富有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的学人,他在享受自由研究学术的权利的同时,也就必须承担自己的学术责任。相反,剥夺学者的学术自由,将学者禁锢在外部规定所许可的领域中,甚至是强加给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课题或任务,就会使得学者们失去应有的责任意识,由此形成习惯于依赖或服从外部组织或权威的心态,结果反而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三是崇尚学术上的新发现与新创造。在研究型大学中,学术研究之所以值得作为核心主题受到崇尚和重视,并非因为学术活动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性品格,而是因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体现为人类本质力量——自由的意识与自觉的实践——的不断增长,表现为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新探索,能够或可能为人类带来新的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思考,能够推进人类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发展与进步。无论是通过理性思辨构建新的理论体系,还是通过科学试验获得新的发现与发明,都是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的教学活动只是培养学生获取创造知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掌握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与能力,显然比单纯掌握知识要更有价值,因为这其中就蕴含着探索和创新的因子。因此,即使是教学活动也应当是一种“研究型教学”,使教学活动成为激发师生创新灵感的重要途径。现在的问题在于,政策导向上的急功近利和社会环境中的浮躁氛围,导致一些大学的学术研究活动创新水平不高,特别是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更少,而大量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甚至相互抄袭等现象比较普遍。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数十年来中国学者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

“匪知之艰,行之维艰”(《尚书·说命中》)。学校自治、学术自由、崇尚创新等等基本办学理念,现在几乎每一个大学人都耳熟能详,从理论上予以承认是一回事,而实际办学过程中许多大学却很

难真正做到这一点。更多的情况是,大学时常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诱惑与压力,沦为外部世界某种世俗力量的附庸,从而难以忠实履行自身的使命,有的大学自身缺乏清醒而坚定的办学理念与学术操守,出于对世俗利益的追求,甚至甘愿随波逐流,就很容易在诸多诱惑中迷失大学自身的发展方向。因此,笔者认为,要建设研究型大学,大学应当有足够大的“定力”能够抵挡住各种有碍自身目标实现的诱惑。特别是那些以建设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高校,更要凝神聚力,心无旁骛,以“咬住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坚定与执著,坚持不懈地加强学术研究与创新的能力建设。

一是要抵挡本科教育以及各种市场化需求带来的办学效益的诱惑。研究型大学的一个直观的标志在于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大、教育水平较高。早在19世纪,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吉尔曼即认为:学术型大学的重要使命还在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并把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该校当时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就体现了这一点:1876年为35:54,1880~1881年度为37:102,1885~1886年度为96:184,1895~1896年度为149:406,可见研究生规模始终大于本科生规模^①。而在当代中国,由于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的影响,本科生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要高于研究生教育,这是近十年来许多大学纷纷扩大本科招生规模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由于中国大学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图书、实验室等)的相对短缺,扩大本科生规模就意味着对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挤压和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不仅如此,教师的大量精力投入于本科教学工作中,就难以集中精力潜心于学术研究,这样势必导致大学整体学术水平的下降,因此,在办学者和教师队伍的工作重心还是本科教育的情况下,实现建设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也许只能是缘木求鱼。当然,人们会认为这一结论或

^① 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外国高等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许有些绝对,因为没有高质量的本科生为研究生教育提供基础和生源,也会制约学校的科研与学术发展。研究型大学绝非排斥本科教育,而是主张本科教育应当少而精,保持适度的培养规模,以满足研究生教育的需要、有利于研究型大学办学目标实现为前提。至于各种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以及非学历的短期培训等,其经济效益更为明显,研究型大学即使从事上述教育活动,也只能作为一种次要的、辅助的工作,不能过多分散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资源与精力。

二是要抵御住来自社会体制中非学术因素的操控或诱惑。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大学的功能与作用,大学越来越进入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心,政府、企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对大学都有着自己的期待,都希望介入或影响大学的办学活动,通过大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譬如,政府通过掌握大学的办学经费划拨权、学校主要领导人的任免权、学科专业的设置权等,对大学始终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和有力的影响。尽管大学时常强调要增加办学自主权,但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宁可放弃这种空洞无物的名义上的自主权,而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的政治与经济目标。近十年来中国高校的扩招、合并之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即使在一些典型的学术研究领域,如各种国家级和部省级重点课题的申报、学科点的增设与评估等,也带有浓厚的官僚行政色彩,许多非学术因素和所谓的“潜规则”在其中发挥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作用,而这种风气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大学越来越失去自身的主体性与品格,造成严重的学术泡沫与学术腐败,在这样的环境中何以建设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呢?

企业的力量同样不可低估。加强校企合作、建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知识与技术联盟,的确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经验。但也同样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较早地意识到大与企业使命与功能的不同,强调外部经济机会的多少不能成为大学教授决定学术活